

汉英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辩证融合

——以莫言小说英译为例

刘勇琪

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

【摘要】：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的语境下，如何平衡译文的易读性与文化原真性，是翻译界的长久命题。本文基于奈达的“功能对等”论与韦努蒂的“异化伦理观”，深入剖析葛浩文对莫言代表作《红高粱家族》与《蛙》的英译实践。研究发现，葛浩文并未偏执于单一策略，而是在归化与异化间游刃有余：处理社会关系及地道习语时，通过贴合英语逻辑的表达确保阅读顺畅；而在涉及“高粱酒”等核心文化符号时，则坚持保留汉语的原始冲击力。这种风格源于译者主体性、出版市场需求与国际文化环境的合力，是文学美感与传播效果的成功取舍。基于此，本文提出“异化为主、归化为辅”的动态平衡原则，并探讨了作者译者深度沟通、技术显化补偿等优化路径，旨在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实证参考。

【关键词】：归化策略；异化策略；莫言小说；葛浩文英译；动态平衡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7.011

引言

在全球化语境下，推动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不仅关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，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。然而，汉英语系的深刻差异，使得莫言笔下根植于高密乡土的民俗、方言及文化负载词，在英语世界中常面临“对等缺位”的挑战。莫言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叙事轴心，融合魔幻现实主义与浓郁的民间气息，涵盖了生育观、饮食象征等密集文化内涵。自2012年莫言获诺奖以来，学界对其作品英译的关注达到新高度。作为核心译者，葛浩文译介的《红高粱家族》《蛙》等著作虽助力中国文学进入西方视野，但中西文化沟壑带来的“陌生感”，依然持续考验着译者的应对策略。

关于翻译策略，施莱尔马赫（1813）最早区分了“使读者接近作者”与“使作者接近读者”两种路径。当代翻译理论中，奈达（Nida,1964）提出“动态对等”（dynamic equivalence），倾向归化以实现功能等效；韦努蒂（Venuti,1995）则批判文化霸权下的归化，倡导以异化作为抵抗策略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国内学者亦贡献了丰富见解：孙致礼（2002）察觉到“从归化趋向异化”的演变；胡安江（2010）剖析了葛浩文的“读者导向”模式；冯全功（2017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葛译异化比例超50%且呈历时增强趋势。这些理论为探讨莫言乡土小说的文化传播提供了坚实框架。

本研究拟通过深度剖析葛浩文译作，探讨归化与异化策略在汉英翻译中的有效应用。采用平行文本对比与定性分析，论证“混合翻译模式”处理文化负载词的优越性，以此丰富译者主体性等理论探讨，并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实践参考。

1 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理论重构

1.1 归化策略

归化翻译主张译者主动向目标语读者靠拢，借助其熟悉的语言逻辑与表达习惯重构原文，从而消解跨文化隔阂，确保译文呈现出流畅、自然的阅读质感。

其理论内核可追溯至奈达（Nida,1964）《翻译科学探索》中的“功能对等”，指出翻译不应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，而应追求“读者反应”的近似。译者往往需要在英语中寻找语义和功能相近的表达，以实现效果上的对应。从18—19世纪英国的“优雅化”实践到施莱尔马赫的语境探讨，归化始终是开拓海外市场、迎合主流审美的重要手段。

在中国当代文学外译初期，归化策极具实用价值。孙致礼（2002）指出，该策略能有效弱化文化负载词带来的认知障碍。以莫言作品为例，对官场称谓及对话的归化处理，能助西方读者无碍切入乡土叙事，但过度归化亦可能稀释汉语原有的美感与文化底色。

1.2 异化策略

异化翻译则倾向于保留源语的语言形式与文化特征，核心在于通过“陌生化”增强文化呈现，实现更深层的跨文化交流。

劳伦斯·韦努蒂在《译者的隐形》（1995）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将其视其作为一种“伦理上的文化抵抗”，旨在挑战文化霸权并捍卫源语尊严。即便译文略显“生硬”，为了捍卫源语文化的尊严与独特性，这种坚持也是必要的。在汉英翻译实践中，异化常表现为音译、直译加注或保留中式修辞。这种方式让中国文化的“独特性”在国际语境中逐渐获得认可。

以莫言作品为例,那些极具民间色彩的意象和隐喻若被替换,乡土文学的精气神便荡然无存,而异化策略正是保护文学原真性、使中国文学立足世界文坛的关键。

异化策略在处理民族性强、审美价值高的内容时尤为有效。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呈现出明显的“杂合体”特征。冯全功(2017)通过实证研究指出,其译本中意象保留比例超过50%,且呈逐步上升趋势。反映出翻译取向正从早期“迎合受众”转向深层的“文化对话”。胡安江(2010)也认为,在读者导向基础上引入异化,利于实现稳定的动态平衡。

1.3 归化与异化的辩证融合与当代演变

归化和异化两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,而是互补共存的动态连续体。在当前汉英文学翻译实践中,两者呈现出互补共存的趋势。

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,胡庚申(2013)强调译者的“适应与选择”,即译者得根据具体翻译语境权衡化与异化的比重;结合汉斯·弗美尔的目的论,策略的选择取决于译事目标。面向大众传播时,归化更具优势;而在学术或深层文化交流中,异化更能体现文化价值。

随着莫言获诺奖及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,翻译策略呈现出“混合主导”趋势。在葛浩文的译本中,这一点尤为明显:俚语等表达多采用归化以保证流畅,而在核心文化意象上坚持异化以保留文化特质。这种灵活的杂合模式既提升了译文的接受度,也有效缓解了读者对中国乡土文化的陌生感,为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提供了范例。

2 莫言小说英译案例分析

2.1 原文文化负载词的类型与特点

莫言的创作深受高密民间文化影响,其文本中大量表达带有鲜明的地域印记。这些词汇已超出单纯语言符号,成为地方历史记忆与民族心理的载体,体现出高密东北乡独特的文化逻辑。

2.1.1 民俗文化词

此类词汇涵盖物质生活的多个层面。包括饮食文化,如“大红袍”、“高粱”、“酒”、历史官场称谓,如“衙门”、以及植根于儒家传统的生育习俗,如《蛙》中关于“送子娘娘”的民间信仰。这些词汇在西方文化中往往存在“空缺”,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。

2.1.2 方言与地域特色词

莫言小说中充斥着粗犷的高密方言。称谓语如“俺哥”、“老祖”不仅界定血缘,更传递乡土伦理的亲疏;而大量生动的粗口如“狗日的”、“畜生”等,则直接反映了底层民众的情感爆发力。

2.1.3 习语与意象话语

莫言善用成语、民间谚语及魔幻现实主义隐喻。冯全功(2017)对葛浩文译本中的500个意象话语统计发现,“动植物意象”与“身体意象”尤为密集。这些意象多具有隐喻功能:若直译,读者难以理解;若完全意译,又会削弱作品的文学特质。

2.2 英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具体运用

葛浩文并未拘泥于单一策略,而是在“为读者服务”的理念下灵活运用归化与异化(冉双双,2023;Fang,2024)。

2.2.1 归化倾向案例:消解文化障碍与提升流畅度

归化多用于功能性表达或可能影响阅读流畅的内容。

亲属称谓的简化:在《蛙》中,原文“田桂花是吕牙的远房婶子,沾亲三分向”。译为:“Tian Guihua was a distant aunt of LüYa,close enough to be considered family.”(冉双双,2023)。英语亲属称谓远不如中文细致。译者舍弃复杂的宗法数字,成功将其转化为西方读者易理解的情感关联。

等值谚语的替换:原文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译为:“Better safe than sorry.”(冉双双,2023)。这种功能对等处理虽弱化了“事”的重复,却契合英语语义,保证了叙事节奏。

方言情感的语用补偿:在《红高粱家族》中,对于称谓“俺老婆”,葛浩文译为“my old lady”。译者没有直译为“my wife”,采用带有亲昵乡土色彩的口语,有效补偿了原文方言的粗朴质感。(Fang,2024)。

2.2.2 异化元素与结合策略:保留文化异质性与审美冲击力

在处理核心文化意象时,葛浩文更倾向保留其“中国味”,并常结合归化手段。

喻体直译:例《蛙》:“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!”译文:“He’s 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’s flesh.”(冉双双,2023)。译者未采用“reach for the moon”,而保留“toad”与“swan”的对比意象,既延续幽默效果,也丰富了英语表达。

音译加注与增译:例《蛙》:“这是武夷山的大红袍。”译文:“This is Da Hong Pao,a fine tea from Mount Wuyi.”;“衙门口,朝南开。”译文:“The yamen,the official residence,has always faced south.”(冉双双,2023)。对于“大红袍”和“衙门”,译者采用了音译加解释性增译。这种“异化起头、归化辅助”的策略,在确立事物名称地位的同时清除了理解阻碍。

地域符号固守:在《红高粱家族》中,“高粱酒”一直被译作“gaoliang wine”而非“sorghum spirit”。对“gaoliang”的坚持,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地域符号,体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敬畏。

2.3 译作策略评析:从历时演变到动态平衡

葛浩文译本的成功,植根于翻译策略随传播语境的动态迭代。冯全功(2017)的历时性研究证实,从《红高粱家族》到《蛙》,译本异化程度不断攀升,折射出译者随莫言国际地位

提升,已从早期的“受众迎合”转向深层的“文化对话”。这种演变构成了归化与异化的辩证共生:归化带来的流畅叙事是跻身西方市场的“通行证”(汪宝荣,2014),而通过异化保留的“凤凰”、“衙门”等符号,则在跨语境中重塑了中式乡土美学的灵魂。如宁明(2021)所述,这种宏观顺应审美、微观坚守原真的“忠实与叛逆”之平衡,为中国文学兼顾传播广度与文化深度提供了成功范式。

3 归化与异化策略在汉英文学翻译中的优化建议

3.1 影响策略选择的多维因素分析

译者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权衡,是译者理念、市场逻辑与宏观语境等多重维度博弈的必然结果,而非主观偶然选择。译者主体性与出版市场相互影响,如葛浩文以“为外国人翻译中国文学”为初衷,兼顾莫言作品乡土根基与西方读者可读性,早期倾向归化;目标语读者文化接受度与语境变迁制约异化尺度,莫言获诺奖后,全球受众对中国文化兴趣提升,为深化异化、保留文化原真性提供可能;文本类型、功能及外部赞助人也发挥作用,乡土小说需灵活切换策略,出版方、编辑意见等也会影响策略选择。借鉴莫言作品外译经验,可遵循“异化主导、归化补充、动态杂合”原则,文本层面针对核心文化意象采用“异化+显化补偿”,对功能性表达恪守归化对等;支撑

体系上,深化译者与作者沟通,借助平行语料库技术赋能,结合读者反馈优化策略,实现文化传播与读者接受的平衡。

4 结语

通过对葛浩文译作的深度剖析可见,归化与异化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,而是汉英文学翻译中平衡文化传播与受众认可的核心支点。葛浩文摸索出的“归化为骨、异化为魂”模式,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:在处理日常习语等功能性表达中以归化降低理解障碍,使译文顺利进入西方阅读语境;在核心文化意象、民俗象征及魔幻现实主义表达中坚持异化,以保留“高密东北乡”的文化特质。这种极具灵活性与层次感的逻辑,不仅将莫言推向国际文坛高峰,更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从简单的“走出去”向深层的“走进来”转型,成为被国际读者深度接纳的成功范例。

本研究存在局限,语料仅为葛浩文英译作品,未涵盖多语种、多译者对比及大规模定量验证。未来研究应拓展语料范围,结合认知与生态翻译学视角,通过眼动实验、读者问卷等实证探索异化程度对海外读者的影响。全球化背景下,译者需秉持“动态平衡”原则,借助翻译技术优化策略,助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冯全功.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意象话语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[J].外国语,2017,40(6):72-80.
- [2] 胡安江.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——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[J].中国翻译,2010,31(6):10-16+92.
- [3] 胡庚申.生态翻译学:建构与诠释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3.
- [4] 宁明.忠实还是叛逆: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[R].山东大学莫言研究系列,2021.
- [5] 冉双双.莫言《蛙》英译本中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应用浅析[J].国学,2023,11(4):367-371.
- [6] 孙致礼.中国的文学翻译:从归化走向异化[J].中国翻译,2002(1):40-44.